

V城·古都·後遺民？

——董啟章、朱天心1990年代「失城」書寫比較

林肇豐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

摘要

「失城」一詞原是香港作家黃碧雲的短篇小說名，後為學者引用來描述1990年代香港文學的主流傾向。在「失城文學」中，董啟章寫於九七前夕的〈永盛街興衰史〉、《地圖集》等，將現實和虛構融冶一爐，彷彿憂傷著城市的失去、批判權力宰制，卻又不願給予定義而時刻游離，使得作品頗具曖昧甚至虛無之意味。而幾乎同一時間，台灣作家朱天心也發表了受人注目的〈古都〉，透過偽觀光客的眼光重新審視台北，而感到這座自己出生成長的城市，如今竟變得恐怖陌生。小說背後自然有其承載的言外之意，就此角度而言，朱天心也失去了她的城市。

對於這樣的兩種書寫，王德威在〈千年華胥之夢〉中皆將之劃入「後遺民」文學的行列。

而本論文則透過比較董啟章的「V城系列」（及〈永盛街興衰史〉）與朱天心的《古都》（及《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漫遊者》），指出兩者的「失城」書寫看似相似，但在主題表現、歷史意識和精神特質上實有關鍵性差異，並不適合皆以「後遺民」涵納之。

如此比較一方面凸顯王德威理論中「遺民」與「後遺民」的含混模糊；二方面也試圖展現台、港兩地的「城市」文學和「鄉土」概念，其實有著不同的脈絡意義。

關鍵詞：失城、V城、古都、後遺民、城市文學

V City and *The Old Capital* as “Post-Loyalist”?

A Comparison of “Losing the city” Novels by Dung Kai-cheung and Zhu Tianxin in the 1990s.

Lin Chao-Li

Ph.D.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Losing the City” is the name of a short story by Wong Bik-wan that scholars have cited as defining a central theme in Hong Kong literature in the 1990s, hence “Losing the City Literature.” Dung Kai-cheung’s *The Rise and Fall of Wing Shing Street and Atlas: The Archaeology of an Imaginary City*, which he wrote on the eve of the handover in 1997, both mourn for the city Dung is going to lose and also offer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domination. But Dung’s critique is hardly explicit, as he eschews precise definitions and conventional narrative temporality. As a result, both of these works are hard to grasp and even nihilistic.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the Taiwanese writer Zhu Tianxin published *The Old Capital*. In this novel, she reexamines Taipei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 tourist who feels estranged from and afraid of the city she grew up in. Her novel, like Dung’s two works cited above, implies that Zhu Tianxin also feels she is losing her city.

David Der-wei Wang discussed both Dung’s and Zhu’s works in terms of “Post-Loyalist” literature in his *The Thousand Year Dream of the Well-Governed State of Huaxu* because both writers remain loyal to a city that they feel they are losing, with the disagreement about Wang’s diagnosis, this paper will argue that Dung and Zhu’s oeuvres are comparable but distinct.

By comparing Dung Kai-cheung’s *V Cit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Wing Shing Street*) with Zhu Tianxin’s *The Old Capital* (and *In Remembrance of My Buddies from the Military Compound* and *The Flâneur*), this study claims that while both Dung and Zhu

appear to feel they have lost their cities, there are nonetheless crucial differences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historical ideology and spiritual qualities that make the “Post-Loyalist” label questionable.

On the one hand this research underlines the ambiguity of “Loyalist” and “Post-Loyalist” in David Der-wei Wang’s theor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aim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concepts of “city” literature and *hsiang-tu*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their respective contexts.

Keywords: Losing the City, *V City*, *The Old Capital*, Post-Loyalist, City Literature



V城·古都·後遺民？

——董啟章、朱天心1990年代「失城」書寫比較

一、此地為他鄉

「失城」一詞原是黃碧雲1994年的短篇小說名，後為編輯《香港短篇小說選》（1994至1999年，三聯版）的學者許子東，引用來描述1990年代香港文學的主流傾向。他指出文藝小說在社會上縱使相當邊緣，在1990年代仍然承擔起建構、改造香港主流意識形態的使命，而「這種意識形態，就是今天很多人在討論的所謂『香港意識』。具體在中短篇小說中，就是種種形態不同技法各異的『此地是他鄉』的故事，就是一種『失城文學』。」¹

若將時間推遠來看，自1970年代中期樂觀自信的「我城」、1980年代懸空而不升不沉的「浮城」（西西），以至1990年代時日將屆／盡的「失城」。這種城市一步步失去的脈絡，確實與香港社會面臨「九七」政權移轉的心態若合符節。趙稀方也曾經指出香港雖非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但因「九七」而高漲的香港意識卻近似國族意識。在「九七」之前「香港憂慮的是『夾縫』和『失城』，在這種營造出來的『香港意識』的浪潮中，『香港』被作了整體化的處理。」²自然，「失城文學」並無法涵括香港1990年代的所有文學作品，但做為一個描述當時主要文學傾向——香港城市的整體化處理——甚至社會文化氛圍之術語，應當是妥適的。

許子東在分析「失城文學」時，由主題內容入手，論點雖不免前後有些參差，但基本上是以「此地他鄉」的概念做為總括，並指出落實在具體文本上有著各種變奏，包括：「漂流異國」（坐洋監）、「此地他鄉」（回流後的失

1 許子東，〈「後殖民小說」與「香港意識」〉，《香港短篇小說初探》（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5.10），頁47。

2 趙稀方，〈「九七」前後的香港小說〉，楊玉峰主編，《騰飛歲月——1949年以來的香港文學》（中國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2008.12），頁125-126。

落、本地人感嘆世事變遷）、「懷舊」（南來者無法面對現實）、「城市異化」（對現代都市形態的疏離）等。這類作品在九七前後會有相當數量出現，原因無他，「總而言之，太愛這個城市了，才會感到失落，才會感嘆『此地他鄉』。」³

筆者曾在一篇會議論文中，基於上述分析重新歸納香港1990年代「失城文學」，認為其在面對「九七」以及思索這座城市的過去和未來上，取徑大致有三：（一）明顯的抗拒；（二）回顧與懷舊；（三）後現代迷態敘述。關於前兩種路徑，此處不擬多談；而本文討論對象之一的董啟章及其書寫，則屬於第三種路徑。

所謂「迷態敘述」，原是柏右銘（Yomi Braester）針對台灣1980年代中期以後，部分文學和電影的新文體傾向而發。他認為當台灣的政治禁忌逐漸打開、以往不可言說之事物開始能暢所欲言時，不少作品卻轉向了迷態敘述。這類型的故事往往到最後是以無法有任何解答作結，顯現出作家們自認無法重新追溯過往記憶，亦不能「拯救歷史」。而這種敘述者／作品的大量出現，應該「歸功」於後現代主義，因為它宣稱完整的敘述體業已駕崩。⁴

我認為這種後現代迷態敘述的傾向，在香港的「失城文學」中，尤其是董啟章的作品亦可見到。例如發表於1995年的〈永盛街興衰史〉，看似以懷舊尋根——追溯一條街的存在與歷史——為主題，但內容特意營造史料、人事、記憶等諸多的斷裂和「不確定」，加上個人想像、欲望的交織滲透，在在使得故事主人翁的撰史之舉，最終指向了歷史的虛妄、真相的難以尋覓（或者，有所謂「真相」嗎？）無可諱言，這篇作品實暗暗諷刺了因「九七」來臨所掀起「在填海而來的混泥土地上的尋根」⁵熱潮。

3 許子東，〈論「失城文學」〉，《香港短篇小說初探》，頁3-18。

4 柏右銘（Yomi Braester）著，黃女玲譯，〈台灣認同與記憶的危機：蔣後的迷態敘述〉，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04），頁233-251。

5 小說語。見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許子東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94-1995》（中國香港：三聯書店，2000.01），頁105。

而寫於「九七」前後的「V城系列」，⁶更是完全不打算探討城市的歷史「真相」。其放縱想像力，透過從未來考古的視角、虛實交錯的手法，重繪疑似真的香港地圖、回顧／打造各種V城、闡述潮物的「個人用法」，以及生產人與物結合的「怪物」。

值得追問的是，如此在後設中透顯趣味、充滿歷史解構氣息的書寫，能夠稱得上是所謂「失城文學」嗎？董啟章個人對於這些作品與「九七」關係的定位，始終是閃爍游移的，認為它們既關乎「九七」又不只關乎「九七」；⁷倒是不少論者指出其創作意念頗為明確，許子東說：「當然，如果真的不值得惋惜，何必再虛構《地圖集》編造『興衰史』？」⁸王德威則表示：「在玩弄種種多元後設理論之外，董啟章對香港的一往情深，仍躍然紙上。」⁹很清楚的，從永盛街直至V城，董啟章筆下寫的全是香港。雖然他在「九七」時刻選擇不寫它的當下，而寫它的過去；或者透過「未來考古學」的視野，挖掘、比對「大回歸」五十年的前後種種，而必定虛構。但重要的是，若是缺少了「當下」香港作為映襯或依歸，事實上作品中那些奇特的設定，以及由設定所延伸出各種貌似合理的想像運作，都將不再那麼有趣、那麼「意味深長」。換句話說，〈永盛街興衰史〉和「V城系列」始終都不會是純虛構的作品，它們亦是因著「九七」到來而進行的反應和構思，那些回首編造一條未必存在的街道之舉動、對於香港地理地圖的各式讀法、擊劃「通道之城」、「酒樓之城」、

6 「V城系列」指董啟章寫於1997至2000年的四部作品，原非「系列」，後於台灣聯經出版公司集結出版（2011、2012年）。其分別為：《地圖集》（原名《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1997）、《繁勝錄》（原名《V城繁勝錄》，1998）、《夢華錄》（原名《The Catalog》，1999）、《博物誌》（原刊於《星島日報》副刊，1999.11.10-2000.07.29）。

7 例如在《地圖集》的後記〈真誠的遊戲〉中，董啟章表示「《地圖集》寫於1997年，不可否認跟九七回歸有很密切的關係。可是，《地圖集》絕對不只是一本關於九七的書」（頁162）；在〈從天工到開物——一座城市的建成〉文中，他則指出「《地圖集》、《繁勝錄》、《夢華錄》這三本小說建構的都是紙上的廢墟，文字的廢墟，符號的廢墟，由是散發著虛擬的氣息……很難否定這種廢墟意識和末日詛咒跟九七的關係，但也許它並不完全是個政治問題，而同時是個文學問題。又或者，在政治和文學兩端，危機更為迫在眉睫的是文學。當然文學問題又不是純文學的問題，而同時是政治問題。廣義來說，是人為社會的建造和維繫，以及文學如何參與其中的問題。狹義來說，是九七回歸對香港文學造成的身分認同的衝擊。」參見董啟章，《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01），頁340-341。

8 許子東，〈論「失城文學」〉，《香港短篇小說初探》，頁11。

9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8.10），頁293。

「店鋪之城」等，同樣可謂「此地他鄉」的變奏——「九七」之後的香港究竟會變得如何？無人知曉。它還會是（現在的）香港嗎？那麼，所謂的「香港」又是甚麼？……董啟章倚賴文字作為通道，從未來出發，回望並虛實交織出城市的種種，以及種種城市。其姿態猶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新天使，只不過將它颳往未來的風暴，並不叫作「進步」。¹⁰

無獨有偶，雖然1990年代的台灣並沒有「九七」將臨和「失城」的不安氛圍，但作家朱天心於1996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古都〉，可謂其「近十年來創作的重要盤整」，¹¹受到大量注目。當然，大量注目亦可能來自於大量爭議，研究者曾經指出在此之前，固然讀者迴響甚眾，學界對朱天心文本的討論卻不多；而自《古都》（1997）起，由於「彼時台灣社會認同議題激盪，學界、文化界開始用更嚴肅的態度來閱讀、評論朱天心。」¹²

〈古都〉¹³以「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以及連續七段的「那時候」開場，拉出台北城今昔對比的敘述格局；而另一個永恆不變的美好對照組，則是日本京都。小說故事的主角與曾經親如「同志」但多年未見的友人，相約於京都，最終未能會面（暗示過往美好的必須斷裂、無可復得？）。提早返台後，她索性拿起日文版台灣旅遊書，以及書中所附的殖民時代地圖，以偽觀光客的視角重新漫遊、審視台北城。她穿梭於台北的大街小巷，出入私我回憶和歷史事件之間，感覺這座自己出生、成長、初老的城市，如今變得極為陌生恐怖。對照起京都事物的千年不變、始終常在而教人放心，她懷疑這座城市

10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自殺身故前的最後作品《歷史哲學論綱》（1940）中，援引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描述天使站在廢墟中面向過去，背對未來。當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修補破碎世界時，天堂卻吹來了一陣風暴，把天使刮向他所背對著的未來，這場風暴便是我們所稱的進步。而我認為董啟章「從未來考古」（未來考古學）的寫作設定，很接近這種背對著未來、面向現在或過去（廢墟）的姿態。參見Walter Benjamin（瓦爾特·本雅明）著，張旭東譯，《歷史哲學論綱》，「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瓦爾特·本雅明」（來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lter-benjamin/mia-chinese-walter-benjamin-1940.htm>，檢索日期：2019.04.08）。

11 王德威語：「無論就題材及氣派來說，這篇作品都可視為朱天心近十年來創作的重要盤整。」見王德威，〈序論：老靈魂前世今生——朱天心的小說〉，朱天心著，《古都》（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7.05），頁26。

12 吳忻怡，〈成為認同參照的「他者」：朱天心及其相關研究的社會學考察〉，《臺灣社會學刊》41期（2008.12），頁5-8。

13 朱天心，〈古都〉，《古都》，頁151-233。

大概「所有你曾熟悉、有記憶的東西都已先你而死了」吧。小說最終結束在主角步往大稻埕碼頭江畔，眼底盡是荒煙廢墟，而問出意味深長的「這是哪裡？……」，隨後放聲大哭。

而出版於2000年的《漫遊者》，則是一部「悼祭之書」，¹⁴內容多數篇章寫於父親朱西甯離世後的「無意志、無重力」漂移狀態下。在其中，朱天心面向死亡、追索死亡，但事實上她對「死亡」本身的興趣不大，而是欲探問摯愛之人在燈熄光滅後的可能去處，以及如何理清生者和逝者之間的「新關係」（雖然未必理得清）。於是她可能沿著尼羅河畔行走、攀越吉力馬札羅山頂；也可能如候鳥翱翔展翼黑水洋，如容格那般飛上高空，望見腳下地球沐浴於藍色光輝中；更可能回到珍而重之的往昔美好，遇見不到三十六歲、長相酷似法務部長時期馬英九的父親，自己則每天依然害羞到不上前迎接喊人。然而這種追蹤靈魂去向的腳步，卻始終不會觸及到現在的福爾摩沙、當下的台北。〈夢一途〉中有著如此片段：「種種，你有意無意努力經營著你的夢中市鎮，無非抱持著一種推測：有一天，當它越來越清晰。清晰過你現存的世界，那或將是你必須——換個心態或該說——是你可以離開並前往的時刻了。」¹⁵這一方面自是對「死亡」一事而言，卻又何嘗不是朱天心對自認之理想美好的「堅持」，以及對島嶼當前諸多「醜惡」的不耐表露？《漫遊者》依然承續著《古都》、甚至是更早前《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的時間與空間認知，數年如一。

就《古都》和《漫遊者》而言，1990年代的朱天心毫無疑問也失去了她的城市；或至少，她是失去「從前」的城市。此地為他鄉，如今的台北已不再是她的「台北」了。

二、「後遺民」或「遺民」

對於董啟章與朱天心1990年代的「失城」書寫，王德威早在〈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中便將它們相提並論，認為朱天心〈古都〉中的記憶變調，與

14 黃錦樹，〈悼祭之書〉，朱天心著，《漫遊者》（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0.11），頁10。

15 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頁43。

董啟章《地圖集》裡對香港作為「轉易地」（transtopia）的思索，有其共通之處。¹⁶

爾後在討論V城書寫和「夢華體」敘事的〈千年華胥之夢〉一文中，¹⁷他進一步指出如果南宋孟元老追憶汴梁繁華的《東京夢華錄》，是建立在遺民文學的基礎上，那麼董啟章打造V城／香港的書寫方式，便開拓了「後遺民」的風格；並以《夢華錄》內容的推「新」出「陳」、「過時的美學」，提出他的疑問：「所謂的『過時』也不過就是幾年之間的事情，何以竟有了天長地久的錯覺？」¹⁸然後帶出他在〈後遺民寫作〉（2004）中的提法／答案：「如果遺民已經指向一種時空錯置的徵兆，『後』遺民是此一錯置的再錯置，但同時也成為對任何新興的『想像的本邦』（imagined community）最激烈的嘲弄。」¹⁹至此，董啟章的書寫入列王德威所規劃的「後遺民」譜系中。

接著王德威提及三位「後遺民」城市書寫作家，其中一位即是朱天心。他認為朱天心在〈古都〉中瑣碎冗長地記錄「歷史的渣滓」，實如南宋孟元老一般自有真情流露；而比起潛文本中古雅典麗的日本京都，朱天心眼下的台北卻是一座忘懷歷史、背棄記憶的城市，以致連孤魂野鬼都無棲身之地。他再次重引〈後遺民寫作〉中的語句：「朱之為『後』遺民，因為她所生存的世紀如此『民主進步』，何來故國前朝之思？當島上的民主運動開花結果，擺脫了各種名堂的外來統治，終於『站了起來』時，朱天心之流退向歷史暗角，兀自啃嚙著世變後的苦果。她的書寫充滿了時不我與的尷尬。……但也正因為去古已遠，她看似不合時宜的張致恹惶，反而引人三思。」²⁰

彷彿皆是來自「世變」，以致董啟章、朱天心都有了時空錯置的茫然張皇。確實，除了同樣奠基於「失去城市」的脈絡外，董啟章出入真實、記憶和

16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頁293。

17 王德威，〈千年華胥之夢——董啟章，孟元老，「夢華體」敘事〉，原刊於《聯合文學》330、331期（2012.04、05），後收於董啟章，《繁勝錄》（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04），頁173-198。

18 《The Catalog》寫於1998至1999年，內容收錄了99篇當時流行事物的「個人用法」。爾後於2011以《夢華錄》之名重新出版時，董啟章寫了題為〈過時的美學〉的後記，提到「事隔只是十年，當中寫到的事物無一不早已過時」。見董啟章，《夢華錄》（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04），頁281。

19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7.11），頁25。

20 同註19，頁52。

想像的「V城」，與朱天心交織文本、歷史的「古都」，加上「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的質問，彼此之間似乎真有幾分相似。但本文認為值得細細追索的是，兩者書寫所呈顯的主旨、意念、精神特質，以及所欲探問之事，真是相同的嗎？王德威將之入列「後遺民」行伍，但他們的「失城」意義是否相同？又是否都為時空的錯置再錯置，以至盡皆嘲弄任何新興的「想像的本邦」？

（一）董啟章：創造與現存世界「對位」的可能世界²¹

讓我們先回到王德威〈後遺民寫作〉的定義：他指出「遺民」一詞，原泛指「江山易代之際，以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者」，其暗示了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因此遺民意識乃是一種事過境遷、悼亡傷逝的政治、文化立場；那「後遺民」呢？承上所述，後遺民的「後」似乎頗有自遺民論述的窠臼解放之義，但王德威認為事實不然，「如果遺民意識總已暗示時空的消逝錯置，正統的替換遞嬗，後遺民則可能變本加厲，寧願更錯置那已錯置的時空，更追思那從來未必端正的正統。」他甚至指出：

如果遺民把前朝或正統的「失去」操作成安身立命的條件，後遺民就更進一步，強「沒有」以為「有」。前朝或正統已毋須作為必然的歷史要素，挑動黍離麥秀之思。就算沒有前朝和正統，後遺民的邏輯也能無中生有，串連出一個可以追懷或恢復的歷史，不，欲望，對象。²²

從這樣的理論規劃來看董啟章的「失城」書寫，視之為「後遺民」基本上是妥適的。董啟章固有其傷逝，但他始終是堅信文字而懷疑歷史的，因此他毋需前朝和正統，也拒絕將「失去」本質化，反倒視之為虛構、想像的生發處。

21 這是董啟章接受訪談時，所闡述自身的創作概念。雖然在前後文脈絡中，其主要是指涉較為晚近的長篇小說寫作，但我認為如此話語也頗適合拿來定位他的V城書寫，整體的精神意念是相同的。見鄒文律整理，〈對「真實」的永恆追尋與創造〉（2006.01.16），董啟章著，《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頁474-475。

22 同註19，頁48-49。

〈永盛街興衰史〉即是相當能夠展現懷疑論意味的篇章。故事的主角劉有信艱苦卓絕地挖掘、寫作一條街道的歷史「真相」，渴望在它徹底灰飛煙滅前為之留下遺言（此處的永盛街多像是在影射香港的命運！）。但同時讀者卻不難發現這位有信頗為「無信」，他的書寫刻意迴避祖輩所有不光明的可能過往、隨意調整角色，選擇性剪裁、編織家族史和地方史。事實上，就連現實中與他同居的女子阿娟，究竟是他的學生或卡拉OK伴唱女郎？他都無法確定。而當他與阿娟共同拜訪永盛街的最後一位耆老之後，阿娟問道：「福伯的記憶可靠嗎？」劉有信的回答竟是：「誰的記憶可靠？」如此反應不禁令人莞爾。身為一位寫史之人卻不相信記憶，那麼他筆下的歷史又如何教人信服？作者董啟章在此自有其微言大義和諷刺。

小說的結尾是所有相關材料、書稿全都付諸一炬，主角居處的老屋也將出售清拆，永盛街的一切終將消失無跡。而劉有信則透露父親月前回港時，聽到他的寫史之舉，只淡淡的說：「永盛街根本就不曾存在，它只是你嫵嫵的夢。」²³於是整篇故事嘔心尋覓斷簡殘編的史料，直至最後卻連永盛街曾經存在與否，都仍是個謎。無怪乎論者會說〈永盛街興衰史〉的特別之處，即在「它始於懷舊，卻結束於反懷舊」，指出了「歷史敘述以至回憶本身的不確定」。²⁴而這種凸顯歷史、懷舊、「尋根」之虛妄性的書寫，一方面當然有指陳殖民地歷史（教育）之空白斷裂，以及揭穿即將前來接收的國族「大話」之能量；但不可否認的是，董啟章同時也解構了香港追尋、重塑自我歷史主體性的可能。面對重大歷史變遷時刻，〈永盛街興衰史〉散發著濃重的徒勞感。

而這樣的意念、精神，依然貫穿董啟章後續的「V城系列」書寫。《地圖集》寫於九七前夕，他以「真誠的遊戲」之筆，²⁵為香港的地理演繹奇思幻想。在〈地質種類分歧〉中，他虛構了地圖學界為因應城市發展的混亂，提出了歸本溯源、深挖「本土」——地質的主張，從而衍生出兩派學者的分歧：其中本土本位主義者主張城市的建立、本土文化的滋長，乃建基於新近的沉積與

23 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香港短篇小說選1994-1995》，頁106。

24 陳智德，〈香港文學的懷舊史1950-2005〉，《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中國香港：花千樹出版公司，2009.07），頁262-263。

25 董啟章，〈後記：真誠的遊戲〉，《地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06），頁161-163。

堆填區。此派人士往往強調「混雜」作為本土的特質；另一批花崗岩學派的學者，則推崇傳統的承續，強調花崗岩作為地底深層廣大地基的事實，並質疑本土派的論據，批評在短短百年間由傾倒廢料而形成的垃圾場「本土」下面，究竟尋得出什麼樣的根？²⁶

這樣的分歧其實影射著過渡期的「香港熱」下，不同立場的史家／文化研究學者之間的論辯；由現下的時空回看，也可說是早早預示了日後的港中矛盾及本土爭拗。但董啟章並未表示支持某方或認同孰為正解，若由深挖地層能夠掌握到本土「本質」的荒謬設定來看，我甚至認為董啟章是將1990年代當時的兩派都給質疑、嘲諷了。九七前後，面對各式國族大話的喧嘩與收編，董啟章的書寫充滿著強烈「無本質、非歷史」的後現代傾向。

看看《繁勝錄》所打造的〈通道之城〉，²⁷ 當中指出「在長達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時期中，V城一直以通道的形態存在，以金錢和貨物的流通為本質，亦即是沒有本質。」這無非是對香港作為一個貿易「自由港」之意象的濃縮提煉，許多時候它僅是人流、物流來來去去的「過程」，它就「只是通道本身，而不是目的地」。而V城「既無本初發源，亦無終極依歸」，那麼它也就「無歷史可言」了。

在〈清明〉中，²⁸ 文字建構／虛構的力量更被抬升得淋漓盡致。小說提到大部分V城的居民，都是殖民時期開埠後才來到的移居者、流徙者，因此他們自絕於宗族傳承、血脈牽連。但每年的清明節V城居民仍會履行拜山祭儀，「他們都各自在碑石上創造了自己家族的先人，刻鑿上代代相傳的譜系，並輔以畫像和生平事跡的記載。」甚至在每次掃墓時，家族後人便會「為自家的族譜補充一些細節，或橫向加添旁枝，或縱向更古老的時代推移」，於是族譜不斷增生、碑石逐漸不敷書寫，而墓地的空間也不斷擴大，最終導致墓地的房地產化，而V城也有了墓碑之城的稱譽。

無論是通道之城的無歷史，或是墓碑之城的杜撰歷史，其精神都與〈永盛

26 董啟章，〈地質種類分歧〉，《地圖集》，頁144-146。

27 董啟章，〈通道之城〉，《繁勝錄》，頁35-41。

28 董啟章，〈清明〉，《繁勝錄》，頁135-140。

街興衰史〉中的擇取、修飾歷史是相通的。在1997年連載於《明報》的「同代人」專欄中，董啟章便曾論及香港史的斷裂性，他認為所謂延續性的史觀其實都是想像、後設出來的，並指出香港乃是一個「無中生有」的地方；²⁹ 因此香港人與其以「尋根」為掩護，不如反過來爭取確立自己的主體性，把自己由追本溯源的「產物」轉移為身分內涵的「生產者」。擺脫「香港製造」的自我標榜，而進行「製造香港」的實踐。「我們有怎樣的文化，有賴於我們怎樣去寫作自己。」³⁰

由V城系列之後的多部曲巨型長篇小說來看，董啟章的確是在實踐自己「製造香港」的倡議。他相信虛構想像、信任文學文字，他認為自己的寫作是要創造另一個世界來抗衡，或找出與現存世界「對位」之處，以使現存世界不要那麼容易固定在某一形態，或即是大家所認定的那個樣子。³¹ 必須老實說，我認為如此熱衷強調歷史之斷裂、「無中生有」、透過文字創造（紙上）新香港的主張，固然展現了相當程度的自信與積極能動，卻不免還是過於沉醉其中而略顯天真（或潔癖），事實上就連董啟章自己也未能「徹底執行」。寫作自己、生產文化、製造香港，真可能全然憑「空」創「新」？義大利著名史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所謂「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³² 早已說明人們即使是在「尋根」、追求歷史「真相」，亦都是由現下的生活語境、冀求或權力運作機制出發，本就沒有什麼純粹的尋根、乾淨而無目的性地追求真相本質。而董啟章的「V城系列」透過「未來考古學」之視野，寫的不也正是1997時候的「現下」香港嗎？挪用克羅齊的話語，我們也可以說：「一切虛構都是當代虛構」。

當然，本文重點並不在與董啟章辯駁歷史觀念，或者質疑「後現代」等立

29 董啟章，〈香港史的斷裂性〉，《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頁50-51。

30 董啟章，〈製造香港〉，《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頁60-61。

31 董啟章：「建造另外的世界為了什麼目的呢？有很多可能的說法。譬如說創造另外的世界來逃避，或者創造另一個世界來合理化現存的世界……在我心目中就是以另一個世界來抗衡，或者不一定是抗衡，而是找出與現存世界『對位』的地方。不要讓現存世界那麼容易固定在某一形態之上，讓大家覺得現存世界必定是現在的樣子。當然撞擊以後的結果就不得而知了。」參見鄧文律整理，〈對「真實」的永恆追尋與創造〉，董啟章著，《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頁474-475。

32 Benedetto Croce（貝內德托·克羅齊）著，田時綱譯，《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08），頁5-6。

場問題。爬梳、凸顯他「無本質、非歷史」的寫作傾向和精神特質，乃是欲表明面對「九七」到來，國族大話的強力收編並納為延續性歷史之一部分，董啟章或許真成為了香港的「遺民」；但同時他的「失城」書寫卻也無意將這座城市主體打造為歷史大敘述，並且還不時解構所謂的「本土」、「香港意識」，甚至質疑「香港」本身，而這便彰顯了相當「後遺民」的意涵了。事實上將「後遺民」推往極致，我認為該當是連「遺民」本身都要被解構的，亦即對於「前朝正朔所遺之子民」的「前朝正朔」，也必須加以質疑和顛覆——無論這個前朝正朔是存在於過往的時空，或是一種未來完成式。

（二）朱天心：去聖邈遠，寶變為石³³

然而，朱天心的「失城」書寫，適合擺放在「後遺民」的譜系中嗎？

承前文所言，朱天心的1990年代三部曲——《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古都》（1997）、《漫遊者》（2000）——在對於空間、時間的認知上，始終是承襲連貫的。這種認知以大白話來講，便是「異國總比台灣好」以及「過往總比現在好」，其背後所折射出的，恰恰不是「老靈魂」的蒼涼老練、看透世情，而是對於自己所認同之歷史的念茲在茲、介懷非常。

我們可以在許多書寫片段見到這種「異國總比台灣好」、「過往總比現在好」的認知展現。就前者言，即使不論行文中經常出現的有意無意貶抑：「你們都故意忽視腳下單脊兩屋坡的閩南式斜屋頂不看，彼此一致同意眼前景色很像舊金山」、「有時車行攔腰穿過幾座盆地邊緣的小丘陵，你若成功的沒被其下的廢料場亂葬崗干擾，而只管被陽光翻飛的相思樹林，會教你立時想起深秋時的某地中海植滿橄欖樹的小島。」³⁴ 就是〈古都〉本身透過日本京都與台灣台北的相互對照，也已經將這種認知發揮得淋漓盡致：例如故事主人翁疑問自己為何能夠在清涼寺無所事事坐一下午，卻走避不及地逃離慈惠宮？在對岸射飛彈時，她想記下眼前也許是最後一眼的台北街景，卻「發覺好難記」，因為

33 語見朱天心，〈去聖邈遠，寶變為石〉，楊澤主編，《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11），頁329-334。

34 朱天心，〈古都〉，《古都》，頁154、頁183-184。

無論左望右望都「無一例外被各種醜怪市招包裹著」、住商不分、人行道擠滿各式各樣東西……。她透露若死前還能有一點時間和記憶「回家」，她會選擇京都而不選擇自己出生、成長、生育子女並初老的城市台北，但「為什麼不是你來自的城市」？因為她認為「那個城市所有你曾熟悉、有記憶的東西都已先你而死了。」她還列舉了荷蘭人、郁永河、沈葆楨等人的話語表示：「不滿那地方的，不自你（按：自己）始。」

而就後者言，無論是〈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匈牙利之水〉³⁵中對眷村過往人事的諸多追憶、「我好想他們」；或是〈古都〉起首連用七段「那時候」開頭所營造的昔日美好；又或者《漫遊者》中求學時期、兒時遷村甚或燈籠節的記憶，無一不好過於膚淺醜陋的現在：

但你真正羨慕這國人的並不是這一點，你羨慕他們勤於砍樹把房子蓋得很醜，日子過得全不沮喪；你羨慕他們賊來迎賊、官來迎官、稱大清良民；你羨慕他們一點不怕戰爭；你羨慕他們，絡繹於途前往菱田小鎮買總統肉粽、保特瓶總統汽水、總統褲、捐金牌給街口湄洲媽祖小廟心存僥倖小孩也能從此到大第一名……，彷彿五六年前同樣去近多了的濱海小鎮、吃白斬雞炸溪蝦炒箭竹筍燙地瓜葉、四合院前拍張兩手做V狀的「嘢」朝聖照片。³⁶

陳建忠說得沒錯，任誰都讀得出來朱天心的「假羨慕」，她不過是以揶揄嘲諷台灣人「庸俗」的政治朝聖心理，去對比自己彷彿更不沾塵埃的銀河之旅、³⁷回憶追思。或許有讀者會反駁，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和〈匈牙利之水〉中，朱天心不也書寫了一些兒時眷村生活的黑暗面嗎？但對於那一切，朱天心顯然是有著比看待島民、「老百姓」更高度的理解寬容，加上透過追憶之筆所

35 朱天心，〈匈牙利之水〉，《古都》，頁109-150。

36 朱天心，〈銀河鐵道〉，《漫遊者》，頁103。菱田小鎮指陳水扁故鄉官田，濱海小鎮則指李登輝故鄉三芝。

37 陳建忠，〈路曼曼其修遠兮——朱天心《漫遊者》的漂泊書寫〉，《中央日報》，2000.12.31，48版。

拉開的距離感，使得那些過往彷彿都敷上一層迷離浪漫的色澤，而終究使人追憶不已，珍而惜之、反覆玩賞。

本文並無意再就朱天心的認同或政治意識形態進行探究批判，相關前行研究已有深入考察。³⁸而之所以摘出「異國總比台灣好」和「過往總比現在好」等認知構造，主要是想表示其背後所凸顯的，乃是朱天心對於承襲自黨國和父輩之歷史視野、價值觀的固守。面對時移事往、神話崩解和本土化運動崛起，她認為自己失去了曾經擁有的美好城市，同時卻也不甘接受而尖諷以待，於是藉著異國之美好、往昔之美好，映襯當下台灣／台北是如此醜陋粗鄙；然而其實最關鍵的，還是在於當下台灣社會的發展和意識型態，並不在她認為的歷史「正確」範圍中。因此當她筆下的主人翁進入新公園時，會有如此露骨的批判：「二二八紀念碑區弄亂了你記憶中的新公園，天啊難道那幾株橄欖又礙誰惹誰！」³⁹然而當她去找尋附近那幢美麗的西班牙房子，亦即六十年前建妥的放送局時，她是否知曉它不只是美麗房子，在二二八事件時該放送局還曾扮演向全台廣播事件經過、發布後續處理事宜的重要角色？台灣歷經重層殖民並有諸多族群共同生活於此，歷史和記憶層層疊疊不足為奇，但朱天心往往只珍視自己的版本，「眼裡揉不得沙子」。⁴⁰由這個角度來說，朱天心的失城書寫如何會是「後遺民」寫作？她為何不正是失落了昔日偉人、主義的「遺民」？

在〈臺灣末世本紀——論朱天心〉一文中，王德威提到朱天心寫作三部曲的姿態各異：寫《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的朱天心還只是老靈魂裡的新鮮人，她看來對一切都不在乎了，卻比誰都更在乎一切；而《古都》推出後，朱除了自衛姿態還多了自省自嘲的色彩；直至《漫遊者》的出版，朱天心顯得清明沉靜起來，雖然其中埋藏了巨大的悲傷（按：指父親朱西甯的過世）。⁴¹如此的條分縷析雖有其道理，但我認為無論是自省自嘲或清明沉靜，朱天心那種「比誰都更在乎一切」的態度，從未隨著時間變遷或父親離世而稍減。只要看看《漫

38 可參考趙慶華，〈認同與書寫——以朱天心與利格拉樂·阿媽為考察對象〉（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吳忻怡，〈成為認同參照的「他者」：朱天心及其相關研究的社會學考察〉，《臺灣社會學刊》41期，頁1-58。

39 朱天心，〈古都〉，《古都》，頁213。

40 阿城語，見〈後記〉，朱天心著，《漫遊者》，頁169。

41 王德威，〈臺灣末世本紀——論朱天心〉，《後遺民寫作》，頁207-221。

遊者》裡世界遊蹤以外的那篇〈《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她對於父親的文學成就是否受肯定、對於知名作家「忘恩背義」的執著，又或者是《漫遊者》後停筆數年再交出的政治小說〈南都一望〉，⁴²都可知曉她何嘗是「一任自己穿透生與死，夢幻與現實，異國與家鄉，悠悠忽忽，不知所終」？又哪裡是「被拋擲，或自願放逐，在歷史的軌道外，他警覺（或嚮往！）自己已成為宇宙洪荒的過客，時間鴻蒙的遺民」？⁴³朱天心始終在她認為正確且該護持的歷史道途上，踽踽前行。

必須說明的是，本文並非認為朱天心不應在乎父親的文學定位和歷史評價（她當然可以），而是懷疑在王德威的譜系規劃中，對於自己的記憶是否「算數」無比執著的她，為何會是「後遺民」？若我們將朱天心對於歷史、記憶的態度與董啟章作一比較，此間的差異或許能呈顯得更加明晰。

如同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或《繁勝錄》，朱天心在〈古都〉中也觸及修剪、編造歷史的問題：她以頗為玩世不恭的語氣寫到二十年後政治正確的寫作者，在提及同輩人／你們成長所歷經的台灣1970年代時，必定會讓你們加入釣運或百萬小時奉獻運動，或替你們安排個事變受難者的父祖輩、或偷偷幫康寧祥發傳單、或認真閱讀《自由中國》、《大學雜誌》而啟蒙等，但事實上「你們與周遭大多數的人一樣對上述種種一無所知。」⁴⁴而對於從前班上幾位不進總統府領壽桃、不為統治者愛國教育所感的同學，她也要（假）羨慕地說到二十年後政治正確的寫作者「不難替她們安排一兩位二二八受難親族、或耕者有其田政策下被合法掠奪過家財的、或在牯嶺街買到《自由中國》或《大學雜誌》並因此啟蒙的，不然就有個替康寧祥郭雨新偷偷發宣傳單的姊姊或男友……。」⁴⁵這種寫作者「安排」、改寫的論調，看來彷彿與董啟章「製造香港」、相信文字力量的後現代立場有些類似，但內裡的精神其實完全不同。董啟章在乎的是「建構」，並無真假問題；朱天心卻是有其「標準答案」的——亦即甚麼才為「真」、才「正確」。故此，她全然否認台灣本土民主運動者為

42 朱天心，〈南都一望〉，《印刻文學生活誌》37期（2006.09），頁46-63。

43 王德威，〈臺灣末世本紀——論朱天心〉，《後遺民寫作》，頁218-219。

44 朱天心，〈古都〉，《古都》，頁157-158。

45 朱天心，〈古都〉，《古都》，頁215。

價值、理念獻身的可能性，世故且輕蔑地視之為「新」政治正確下的擦脂抹粉；而她則堅信自己的家國記憶、歷史版本。說到底其「後現代」不過是一種姿態，一種因時制宜、黨同伐異的武器。

經過上述爬梳、比較，我們將會面臨理論上的疑難。王德威明確知曉朱天心的焦慮有其歷史因緣：「作為外省第二代作家，朱面對氣焰日盛的本土主義，有不能已於言者的疏離抑鬱。而昔日所信奉的偉人已逝，主義不在，也使他悵然若失。」⁴⁶卻依然將朱天心劃入「後遺民」譜系之中，這究竟是如何「辦到」的？重新翻查〈後遺民寫作〉，我們將赫然發現王德威長期以來的論斷，竟是建立在「朱之為『後』遺民，因為她所生存的世紀如此民主進步，何來故國前朝之思？過了這個村，沒有那個店。但也正因為去古已遠，她看似不合時宜的張致恚惶，反而引人三思。」⁴⁷這樣的話語基礎之上。此處王突然將「遺民」的概念嚴格限縮在君權時代，並讚嘆起台灣社會的「民主進步」，實在不難看出他話裡所帶的針刺。但真正的重點在於，究竟為何「民主進步」便不會有「故國前朝」之思？君不見每逢政黨輪替，世人皆稱「改朝換代」；而朱天心筆下的埋怨譏刺又所為何來，不正也是對於自己家國歷史版本的念茲在茲、頻頻回首。稱其無故國前朝之思，恐怕連朱天心本人都要抗議。

此外，王德威也認為若遺民意識暗示了時空的消逝錯置、正統的替換遞嬗，那麼「朱天心式的後遺民們則是變本加厲，寧願更錯置那已錯置的時空，更追思那從來未必端正的正統。」⁴⁸在漂亮的語言之外，必須嚴肅思索的是，遺民的遺民是否就等於「後遺民」，變本加厲為何不仍然還是錯置時空、追思正統的「遺民」？

事實上，縱使王德威曾提及後遺民的「後」，頗有自遺民論述的窠臼解放之義，它可以暗示一個世代的完了，也能指向對時空錯置的解散。⁴⁹但〈後遺民寫作〉通篇，都只能夠見到王德威論述「完而不了」和「再錯置」的那一面向，也就是說「後遺民（寫作）」理論早早已排除了「解」遺民、反離散和

46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後遺民寫作》，頁52-53。

47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後遺民寫作》，頁52。

48 王德威，〈臺灣末世本紀——論朱天心〉，《後遺民寫作》，頁218。

49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後遺民寫作》，頁25、47-48。

落地生根的可能，而只願意談論離散、傷逝，或者再傷逝。然而，即使只針對「完而不了」和「再錯置」的面向進行申論，如同筆者在前文中所提過的，「後遺民」都不應該只是對於新興的「想像的本邦」進行嘲弄而已——「遺民」做為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者，其拒斥新邦國毫不稀奇；然而「後遺民」之為「後」，該當是要對所有的「想像的本邦」都要有所懷疑。否則，「遺民」和「後遺民」之間並不會有任何實質的分別。

關於這一點，在〈千年華胥之夢〉文中，王德威自己其實已將此間差異表述得十分清楚：

比起這三位作家（按：包括朱天心），董啟章走得更遠，他的文字實驗也更激烈。他堅信他的香港既然是以城市形態浮出歷史地表，也就沒有向任何正統國家論述輸誠的必要。如上所述，他將城市和虛構緊緊聯合一處，以城市湧動的欲望想像，無盡排列組合的空間，挑戰歷史大敘述。⁵⁰

董啟章不信任歷史、不為任何國族大話背書；但朱天心有其執著、歷史包袱，面對時移世易，她不甘就此鬆手因而尖刻以對。她並非「後遺民」，她就是「遺民」。

三、代結語：在「失城」與「失國」之間

本文之所以花費大量篇幅與王德威商榷「後」字，並非在玩文字遊戲，而是董啟章之為「後遺民」和朱天心之為「遺民」的定位，相當程度即反映了香港、台灣「失城」書寫——城／都市文學⁵¹——的典型意義，以及兩者之間的差異。具體來說，「後遺民」延續了港人長時間以「城市」、「市民」自我想像、定位，游離於家國之外的「傳統」；於此而言，「城市文學」與香港文學

50 王德威，〈千年華胥之夢——董啟章，孟元老，「夢華體」敘事〉，董啟章著，《繁勝錄》，頁192。

51 台灣較常使用「都市文學」此一辭彙。

的重疊面積甚大。相對的，「遺民」則映射出「都市文學」在台灣文學中的特殊性，尤其1980年代後期都市文學以反鄉土寫實的姿態被提倡，當時文學界確實形成鮮明的「台北的」、「台灣的」二元對立結構。

（一）香港

梁秉鈞（也斯）在〈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文中曾經提問：「香港從四九年以來多少繼承了二、三〇年代中國文藝中城鄉對立的傳統，它如何發展成爲一個重視城籍多於國籍的地方？」⁵²關於這個問題，該文後續並沒有很明確的處理。而我們若將之反向發問，它其實是一個不少人都曾有過的疑惑——香港有「鄉土文學」嗎？⁵³

在「九七」前後的香港熱潮中，曾有中國學者提出「香港鄉土文學」的概念，但甚少獲得香港本地學者或台灣學者的共鳴迴響。究其原因，恐怕在於他們為了遷就現實中香港主流的城市想像，於是將傳統的「城鄉對立」轉變為「窮巷」與「繁華市中心」的對立，期望這種詮釋模型能夠在城市場域中繼續運作。但試問「巷」是否必定為窮？「市中心」本身便沒有「巷」的存在？所以如此定義香港「鄉土」的方式，對於1970年代香港高度都市化後的文學發展，以及那些並不批評資本主義罪惡城市的作品，幾乎便難置一詞。也因此，他們所擊劃的香港鄉土文學系譜，經常就是侶倫《窮巷》（1947）、黃谷柳《蝦球傳》（1948），以及舒巷城〈鯉魚門的霧〉（1950）、《太陽下山了》（1960）三位作家作品，至多再加上1970年代的海辛，便幾乎是全部了。⁵⁴

事實上香港並非沒有「鄉土」，它有郊野有離島，在新界仍能見到漁村和農村。但重點是港人認知、想像香港的方式，乃是將之整體視作一座城市，並以「市民」自居。這樣的自我定位從何而來？香港在1960年代以前人口流動

52 梁秉鈞，〈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歷史、範圍與論題〉，《作家》14期（2002.02），頁95。

53 在台灣提及「鄉土（文學）」一詞，需要細辨其意涵所指為「本鄉本土」或「鄉村土俗」；但在香港的討論脈絡中，其基本上皆指涉「鄉村土俗」之意。

54 相關討論可參見許翼心，〈香港「鄉土文學」芻論〉，《香港文學》56期（1989.08），頁4-8；艾曉明，〈非鄉村的「鄉土」小說——關於舒巷城小說的「鄉土」含義〉，《香港作家》115期（1998.05），頁10-11；袁良駿，〈也談香港小說的都市性與鄉土性〉，《大公報·文學》334期（1998.12）；趙稀方，〈小說香港〉（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03.05）。此外，袁良駿尚有多篇相關文章或專著章節。

甚大，直到1966年本地出生的人口才首次達到超過半數的53.8%。⁵⁵ 必須要到六七暴動（1967）以至麥理浩的「黃金十年」（1970年代）後，當香港社會有了穩定生活於此的人群，才逐步有本地意識的產生；而這黃金十年同時也是香港經濟起飛、屋宇和徙置大廈不斷往天空發展的時刻。換句話說，香港本地意識的生成與經濟起飛、高度都市化幾乎是同時間展開，正如朱耀偉所言，香港「在殖民時期已經發展成比其殖民者更先進的全球資本主義社會，……鄉土變得難以作為本土論述的主要課題。鄉土的本土想像便要由城市來取代。」⁵⁶ 而1975年西西連載報章上的《我城》，即可謂該時空環境和「時代精神」最經典代表。其中的「城籍」說——你的國籍呢？有人就問了，因為他們覺得很奇怪。你於是說，啊，啊，這個，這個，國籍嗎。你把身分證明書看了又看，你原來是一個只有城籍的人⁵⁷——更成為香港（人）的城市想像及身分定位之特殊隱喻。由此，香港文學的大宗，始終便是城市文學了。

《我城》的樂觀自信到了1980年代前途談判後，蒙上一層陰影。而隨著九七的逼近，由「浮城」到「失城」甚至「狂城」，香港／城市文學始終有著相應於時代的表現。筆者在前文中雖然曾引趙稀方所言，指出香港的本地意識因九七高漲而近似國族意識。那麼失城之人也就彷彿失國之遺民了？然而，近似於國族意識畢竟還不是國族意識，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九七」前所有關於「失城」的反應和書寫，激進程度固然有高有低，都是在終局已定的前提下有所生發；二方面長時間「活在家國之外」的自由，使得市民認同「無國狀態」也多於被限定某種「國家認同」。⁵⁸ 董啟章的「失城」書寫更是如此，從他的作品中我們不難讀取到對於香港鮮明、強烈的情感，但它並不會再有任何的「更進一步」。作為身處英、中兩帝國夾縫、又歷經後現代深刻洗禮的城市子民，董啟章可謂早早對國家幻滅的安那其（anarchism），他是任何國族主

55 林泉忠，〈「九七回歸」與香港華人的認同問題〉，張啟雄編，《時代變局與海外華人的族國認同》（台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2005.03），頁91-107。

56 朱耀偉，〈小城大說：後殖民敘事與香港城市〉，《本土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台北：學生書局，2002.05），頁172。

57 西西，《我城》（台北：洪範書店，1999.08），頁150。

58 羅永生，〈「不從國教」的香港〉，《殖民家國外》（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07），頁49-61。

義的後遺民。

（二）台灣

台灣的「都市文學」脈絡，則與香港完全不同，其基本上作為一種後現代思潮的具體表現形式，以反鄉土寫實之姿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被高舉。當時的「後現代」、「新世代」與「都市文學」旗手林耀德在接受訪談時便表示，號稱寫實派的鄉土文學作家，實際上都陷入假性鄉土派的處境中，他們多半都生活於市鎮，寫的卻是被童年潛意識壓縮的鄉土，完全忽略195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的形態：

五〇年代後，農業在臺灣整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上，所佔比例微不足道，依賴輕工業、加工業及轉口貿易賺取外匯，必然存在著跨國公司，存在著城市「剝削」農村，存在著買辦階級。而他們以島內意識形態思考的結果，所批判的對象皆是建立臺灣經濟的龐大貿易商、文化掮客、城市資本家、金融家與銀行家，批判轉口貿易形態與服務業，試想，若把這些扔入太平洋，臺灣經濟剩下什麼？臺灣現實就等於零。⁵⁹

如此的批判可謂相當嚴厲。但有些時候林又會強調「都市文學」並非1970年代「鄉土文學」的對立面。⁶⁰此話怎講？因為在他的定義中，「都市」並非與鄉村、山林相對的明確地點，都市小說／散文／詩也不是某種「次文類」的標示，他認為「都市」所指乃是「流動不居的變遷社會」，並十足顯現了台灣1980年代的特質。「都市文學」一詞實可將「八〇年代」吸收在內。⁶¹

關於這樣的論調，我們不免感覺它「太快了」，在當時「都市／流動不居的變遷社會」真已是台灣的全部？並且可以反過來統括1980年代台灣文學的各種潮流現象嗎？這其中當然有著「台北中心」的思維，更可視為當時的文學

59 楊麗玲，〈文學惡地形上的戰將《林耀德》〉，《自由青年》726期（1990.02），頁44。

60 林耀德，〈都市：文學變遷的新座標〉，《重組的星空：林耀德論評選》（台北：業強出版社，1991.06），頁199。

61 林耀德，〈八〇年代臺灣都市文學〉，《重組的星空：林耀德論評選》，頁208。

「新世代」為了佔位而刻意誇大的論述策略。

向陽在一篇比較早期的文章中便觀察到，1980年代的台灣文學逐漸出現「城鄉差距」的分化現象，而形成了「台北的」（後現代）與「台灣的」（本土）兩支文學陣營。他並指出「台北的」後現代文學論者在移植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時，有意無意地把後現代的政治性與抵抗性都給忽略、解構掉了，他們的書寫變成了只是羅青口中的「反映了經濟發展成功、物質慾望翻轉後，所帶來的無比自信以及精神創造的需求」。⁶²

雖然這樣「台北的」與「台灣的」的城鄉二元對立架構，有比較粗略的理型化分配之嫌，並無法涵蓋當時所有的台北書寫，范銘如也曾以「本土都市」的視角而有所質疑。⁶³但我認為在各式作品之外，此詮釋架構對於描述當時的意識形態狀況，依然有相當的詮釋效力；而且我更認為朱天心1990年代的「失城」書寫，恰恰正是延續了這種特殊的反本土「都市文學」理路：自三三時期開始的反鄉土寫實、「後現代」的形式技法，以及在政治上強調自己爭取的是「不認同」的自由⁶⁴……無一不與「台北的」文學意識形態陣營相符。但是，當然到了1990年代尤其後期，她認為自己是連「台北」都失去了，這也許就不是早逝的林耀德的課題了。

與向陽在國族認同立場上全然不同的呂正惠、趙遐秋所編之《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對此文學路線卻也有類似的犀利分析：

台灣後現代思潮的興起，可以相當準確地劃定在80年代的中期。……後現代思潮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運動，它其實暗含了一種反對態度：既反對鄉土文學原先的左翼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也反對80年代日漸壯大的

62 向陽，〈「台北的」與「台灣的」——初論台灣現代文學的「城鄉差距」〉，鄭明嫻主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11），頁39-57。

63 范銘如，〈本土都市——重讀八〇年代的台北書寫〉，《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8.09），頁179-212。

64 趙慶華指出「朱天心所立意爭取的『不認同的自由』，或者以『後現代』的前衛姿態作偽裝的『游移的認同』，終究不過是她對當前『台灣』認同的逆向操作——她所抗拒的是認同的『對象』——台灣，而非『認同』本身。而主體對於「認同」的重視程度其實恰恰反映了其所立足的基點——朱天心所擁有的強勢地位致使其得以侈言『認同有那麼重要嗎』。」參見趙慶華，〈認同與書寫——以朱天心與利格拉樂·阿媯為考察對象〉，頁99。

台灣文學論的「台獨」色彩。表面上它反對文學的政治性，實際上它同時反對鄉土文學中的統、獨兩派，並希望國民黨政權能維持下去。⁶⁵

由此來看，1990年代朱天心恍若遊魂般漫步於台北城，訝異眼前的市民竟能生活得如此豁達、全不沮喪，她懷疑自己的記憶是否都不算數。她的失城，幾乎是失國了。



65 呂正惠、趙遐秋主編，《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06），頁342。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8.10）。
- ，《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7.11）。
- 朱天心，《古都》（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7.05）。
- ，《漫遊者》（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0.11）。
- 朱耀偉，《本土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台北：學生書局，2002.05）。
- 西西，《我城》（台北：洪範書店，1999.08）。
- 呂正惠、趙遐秋主編，《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06）。
- 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0.04）。
- 林耀德，《重組的星空：林耀德論評選》（台北：業強出版社，1991.06）。
-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9）。
- 張啟雄編，《時代變局與海外華人的族國認同》（台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2005.03）。
- 許子東，《香港短篇小說初探》（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5.10）。
- 許子東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94-1995》（中國香港：三聯書店，2000.01）。
- 陳智德，《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中國香港：花千樹出版公司，2009.07）。
- 楊玉峰編，《騰飛歲月——1949年以來的香港文學》（中國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2008.12）。
- 楊澤主編，《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11）。
- 董啟章，《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01）。
- ，《地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06）。
- ，《博物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04）。
- ，《夢華錄》（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04）。
- ，《繁勝錄》（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04）。

趙稀方，《小說香港》（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03.05）。

鄭明姍主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11）。

羅永生，《殖民家國外》（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07）。

Benedetto Croce（貝內德托·克羅齊）著，田時綱譯，《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08）。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朱天心，〈南都一望〉，《印刻文學生活誌》37期（2006.09），頁46-63。

艾曉明，〈非鄉村的「鄉土」小說——關於舒巷城小說的「鄉土」含義〉，《香港作家》115期（1998.05），頁10-11。

吳忻怡，〈成為認同參照的「他者」：朱天心及其相關研究的社會學考察〉，《臺灣社會學刊》41期（2008.12），頁1-58。

梁秉鈞，〈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歷史、範圍與論題〉，《作家》14期（2002.02），頁95-111。

許翼心，〈香港「鄉土文學」芻論〉，《香港文學》56期（1989.08），頁4-8。

楊麗玲，〈文學惡地形上的戰將《林耀德》〉，《自由青年》726期（1990.02），頁42-47。

（二）學位論文

趙慶華，〈認同與書寫——以朱天心與利格拉樂·阿媽為考察對象〉（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三、報紙文章

袁良駿，〈也談香港小說的都市性與鄉土性〉，《大公報·文學》334期（1998.12）。

陳建忠，〈路曼曼其修遠兮——朱天心《漫遊者》的漂泊書寫〉，《中央日報》，2000.12.31，48版。

四、電子媒體

Walter Benjamin（瓦爾特·本雅明）著，張旭東譯，《歷史哲學論綱》，「中文

馬克思主義文庫——瓦爾特·本雅明」（來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lter-benjamin/mia-chinese-walter-benjamin-1940.htm>，檢索日期：2019.04.08）。

